

民主的模式

[英] 戴维·赫尔德 著

燕继荣 方向勤 译

白平浩 秦立彦

王浦劬 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第八章 苏联解体以后的民主

1989 年底和 1990 年初席卷中欧和东欧的剧变，促成了一种庆祝的气氛。自由主义民主被看作进步的代表，资本主义被看作是唯一可行的经济制度。一些政治评论家甚至借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历史的终结”来称颂西方对其他政治和经济选择的胜利。在此之前，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分裂，一个被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冲突和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的政治经济压力搞得四分五裂的世界，打破了自由民主世界中对稳定和进步的自我陶醉。而现在，对民主理性和市场取向的思想的信仰似乎又可以重新恢复了。

1989—1990 年期间发生席卷中欧和东欧的转轨，由于 1991 年 8 月俄罗斯的事件——群

众普遍反对 8 月 18 日—21 日的政变图谋——而得到了进一步加速发展,本章旨在探讨围绕着这种转轨的含义而提出的种种看法。西方民主已经胜利了吗?自由主义民主已经最终取代了所有其他形式的政府的合法性了吗?意识形态的冲突终结了吗?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日益明显的是,有关 1989 年的争论并不仅仅是关于那一年的事件以及随后而来的一系列事件的争论,其重要性也不仅仅限于这些事件本身。它也是关于当今政治世界构成过程和结构的特性和形式的争论。本章将侧重从微观的角度,就民主的过去、现在和可能的未来提出一些关键性问题。本章不提出另一种民主模式,但是,将对民主的变化背景进行探讨。这种探讨构成了本章的主要内容,它强调的是这样的问题:今天,民主应该意味着什么?

本章分为三节。第一节对 1989 年和那一年的事件的历史背景进行简要的考察。第二节集中讨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著作,在后来关于横贯欧洲的政治剧变的讨论中,他的著作常常被人们引证,在英美世界中,尤其如此。福山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已经消逝,自由主义是仅存的可靠的政治哲学。第三节侧重探讨阿历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的著作,他当时就对福山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卡利尼科斯把东欧的剧变解释为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胜利,这一胜利使马克思主义与直接民主在今天更加具有相关性,而不是相反。本章结束时,将对这些不同的观点如何看待政治的善、民主的作用和本质作一小结,1989 年以及那以来的事件,已经迫切地把这一问题提上了日程。

历史背景

政治体制的变化在 1989—1990 年横贯中欧和东欧的许多国家,其中包括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从任何角度来讲,这种变化都是震撼全球的。他们在欧洲内外形成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亢奋感,如同卡利尼科斯正确指出的那样:

远在那些受到直接影响的国家之外的人们都突然感到各种可能都会发生。战后世界似乎不可变易的许多设置突然消失了——柏林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前不可改变的假设,比如欧洲将永远在超级大国之间保持分裂状态,突然破灭了。^{〔1〕}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民主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明确分野,已经开始消失。超级大国之间的激烈对抗模式可能是 20 世纪下半叶世界政治的主要现实,现在几乎一下子就改变了。如果不把这种变化看作以前的共产主义集团内部事务的一种根本变化(或者一系列根本变化),并且更广阔地看,如果不把这种变化看作国际秩序中的根本变化(或者一系列根本变化),那么,很难说什么东西可以在本质上称之为根本性变化了。

但是,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尽管“根本性变化”一词似乎准确地描述了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广泛的、急剧的和出人意料的转变,描述了这些变化中人民走上华沙、布达佩斯、布拉格、柏林、布加勒斯特和其它城市街头的异乎寻常的活动,但是,它却使人们忽视了这些变化的动力和1989年以前的过程。虽然“根本性变化”一词不断被人们用来指称1989—1990年的事件,但是,应该记住,这些变化的根源却由来已久。重大的政治变化起初发生在80年代初的波兰,稍后又发生在匈牙利。在1989—1990年的“戏剧性”事件发生之前,共产党人在波兰的选举中失败,一党制的原则在匈牙利被放弃,它提醒人们,如果确实必要,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中的变化充其量只有在缓慢和平稳发展的情况下才是可以承受的。

80年代后期中欧和东欧的这些缓慢但重要的变化的支持力量,是米哈依·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发动的改革过程。正是克里姆林宫战略性思维中的转变,可能构成了这场剧变的最直接的原因,^[2] 其他的原因还包括公民社会中共产主义力量和苏联集团经济的逐步弱化。尤其是苏联决定用“西纳特拉主义”(Sinatra 即容许各国选择发展和繁荣的道路的政策:“走你自己的路”)代替勃列日涅夫主义(即如果必要,运用强力保护东欧“社会主义成果”的政策),这一决定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生存能力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广泛而深远。“西纳特拉主义”取消了红军或华沙条约干预的威慑,不同意运用强力制服大规模动乱,从而有效地抽掉了东欧共产主义的基础。东德的发展是这方面的典型。当匈牙利开放它与奥地利的边界时,引发了东德向西德的大规模移民,东德内部的压力迅速加大,不断发生于莱比锡及其附近城市的示威游行日益激烈。东德当局没有像

惯常那样诉诸武力，而是企图通过批准经过新开放的柏林墙进入西德来平息叛逃的群众。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东德当局对原本已十分棘手的局势失去了控制，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破坏无遗。

1989—1990 年国家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可以进一步向前追溯。指出三个方面的压力也许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的战略思维会发生变化，而且有助于说明为什么这些变化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首先，苏联经济没有与世界经济制度结合为一体，这种状况可以使它在短期内，避免遭受为使生产力达到具有竞争性水平所带来的压力和不稳定，而具有竞争性水平的生产力则是在国际分工中发挥持续作用所必需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却使它软弱无力，缺乏竞争力，在技术革新方面，这种情况尤其突出。集中管理的经济愈益依赖进口技术和国外资金和投资，这种僵化的在其发展的最好时期也缺乏灵活性的经济，找不到使经济良好运行的途径。第二，与这种状况相伴而生的是重新出现的地缘政治压力，这种压力是由 7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尤其是在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推动下）冷战的加剧造成的。在新一轮军备竞赛中，越来越复杂的武器系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竞赛给苏联的财政、技术和管理资源造成越来越大的负担。冷战的代价对于双方都是难以承受的，但是，它的特定结果，是耗尽了苏联经济脆弱的组织和基础。

第三，前几十年，在苏联集团中出现了严重的冲突和分裂，由此导致了压制匈牙利（1956 年）、捷克斯洛伐克（1968 年）和波兰（1981 年）不同政见者的大规模镇压行动。尽管这些行动在短期内有效地压制了抗议活动，但是，它们却没有持久地防止市

民社会中不同政见者、社会运动和独立组织的繁衍。80年代波兰的变化,尤其是团结工会的形成,决不是整个东欧发生的事情的集中体现,波兰状况形成的原因在于它特殊的种族和民族的同一性,天主教會的势力和波兰土壤中对于妨碍其发展和统一的外部力量的强烈的敌视感。但是,它们是正在发展的特定民主压力的标志,这种压力“击退国家”,创立一个独立的市民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公民可以摆脱直接政治指令,从事自己选择的活動。在整个80年代,团结工会力图创立独立的信息、文化交流和社会关系网络,来培育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它重新确定并扩展了民主的社会运动的含义,同时,极大地削弱了国家控制的政治变革的吸引力。

以上的论述决不是对1989年以来的重要事件和发展的透彻分析。不如说,它是要作一种历史的勾勒,为本章的主要问题提供一种背景,这个问题是:考察这种根本性变化的含义是什么,它们对于民主及其未来有什么启示。

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胜利?

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又面临着日本经济的挑战,直到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即将到来的苏联内部的变化之前,他们在70年代后期心理上明显笼罩着阴云。80年代大量的学术出版物,使这种阴云益发浓重,这些出版物包括罗伯特·基奥恩(Robert Keohane)的《霸权之后》(1984

年)和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1988年),它们记录了美国的(相对)衰落,探讨了这种衰落对于世界政治和政治经济的含义。它们指出,美国的军事力量与生产力和财政收入增长能力之间越来越不成比例,经济对抗破坏了生产力和财政收入增长能力,同时,它们对美国的未来,对这种衰落对于西方防御和稳定的影响发出了警告。很少有人预见到,对于80年代末苏联急剧衰落的评价,必然会抵消这些忧虑。

弗朗西期·福山的论文“历史终结了吗?”(1989)和“答我的批评者”(1989—1990),是我们以下讨论的重点。这两篇论文以及他后来的论文“历史的终结了和终结者”(1992)的发表,不仅重新确定了与早期关注美国从霸权地位衰落相反的看法,而且以一种自信和确定的语气,进一步重新确立了西方价值具有无比优越性的信心。福山是美国国家政策规划部副部长,他不仅庆祝“西方的胜利”,而且,如他所说,庆祝“历史就这样终结;这就是说,这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结点,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普遍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3]在报刊杂志和更广泛的选举媒介中,福山的预言得到了广泛的报道。尽管他的看法遭到了很多批评,但是,在对福山持批评态度的人中,大部分人似乎承认,他的“主要观点——在世界意识形态市场上,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现在缺乏有竞争力的反对者——确实是难以批驳的”。^[4]

福山的预言重新引起了50年代和60年代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早期争论。但是,后来的争论集中在西方的衰落对于支持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意义,集中在仅仅是政府干预和支出是多一些还是少一些的政党分歧上,就此而言,福山的命题在哲学上和政治上都更进了一步。它有四个主要内容。它明显强调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是历史的动力。福山吸取了黑格尔的某些精

神,认为历史可以被理解为意识或意识形态发展阶段的连续过程;这就是说,历史是一系列政治信仰的连续过程,这些信仰包含着对于作为社会秩序基础的基本原则的不同看法。这种连续过程代表着人类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从片面的和特定的意识形态——比如支持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意识形态,向着具有更加普遍性内容的意识形态发展。按照福山的判断,今天,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一发展的最后阶段。

第二,历史之所以已经终结,是因为意识形态冲突实际上已经终结。自由主义是最终胜利的意识形态。福山指出,这一看法的核心“是这样的认识,即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形成了关于自由主义民主的合法性和可行性的明显共识”。^[5] 20 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对立者或者已经失败,或者正在失败。今天的主要挑战者——像穆斯林一类的宗教运动或今天东欧存在的民族主义运动,仅仅表现了局部的或不完整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没有其他意识形态的支持,它们信守的信仰是不能维持的。从长远来看,无论宗教信仰体系,还是民族主义信仰体系,都没有提供替代自由主义的完整的另一种选择,因此,它们没有“普遍”意义。只有自由主义民主,加上经济组织的市场原则,才构成了“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发展。^[6]

第三,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所有冲突的终结。冲突可以有各种来源,实际上也会有各种来源,这其中包括各种各样(当时的)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民族主义者和宗教集团;闭关自守于历史之中或者历史之前的人民或者集体。这就是说,他们仍然处于自由主义世界“之外”(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或者说他们仍然是“内部的局外者”(那些身处自由主义世界中,但是还没有充分感受到自由主义必然性的人们)。此外,也存在着世界发展

两极化的危险,这种两极化尤其可能发生在“后历史”的自由主义社会与具有其他传统的、尚未现代化的社会之间。福山坚持认为,这种两极化肯定会引起激烈的斗争,但是,它们不会导致可以替代自由主义的新的系统的政治和社会正义思想。

第四,福山对于“历史的终结”并不是完全没有相互矛盾的看法的。他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时期”。^{〔7〕}人类的想象的大胆飞跃和为了重大原则进行的勇敢斗争,将不复存在;政治将成为市场调节过程的扩展。为了满足顾客要求而进行经济管理和解决技术问题,将代替理想主义。总之,福山重新提出了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命题(尤其突出的是他考虑了普遍信仰体系的前提以及各种主张对于普遍性的批评),他断言,一度为了统治世界的地位而相互斗争的人类解放的勇敢、英雄、“伟大的故事”已经讲完了。然而,尽管在他的言论中明显带有遗憾地提到了这一点,可是,他对于自由主义一般还是表现出了乐观主义的看法。今天,意识形态的共识既不是“完全普遍的,也不是自动自发的”,但是,它的存在“程度要高于过去一个世纪的任何时候”。^{〔8〕}“自由主义民主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是清晰的历史进化模式的最后阶段。

福山的著作被广泛称颂为“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教科书”。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为 80 年代西方主要的政府,尤其是里根和撒切尔政府的许多陈词滥调提供了精致的论证。它们强化了新自由主义新右派的预见,这些右派预言社会主义将消逝,市场和最低限度政府是唯一合法和可行的未来。但是,如果认为福山的观点与这些新右派完全一致,那就错了。一种以一般政治预言为基础的泛泛政治见解并不需要仔细梳理,即使它的大部分

细节中存在着严重的不一致。

但是,人们对于福山的观点提出了严重的疑问。首先,自由主义不能简单地被看作一个整体。如前所述,有约翰·洛克,杰瑞米·边沁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等人确立的不同的自由主义系统,它们对于个人的存在、自主性、人的权利和责任、政治共同体的正确本质形式,都有着相当不同的看法。福山并没有系统地分析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他也没有对人们应该在它们中间如何选择提出任何看法。这是一个明显的空白,因为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争论的场所。^[9]

此外,福山也没有探讨自由主义民主中“自由”的内容和“民主”的内容之间是否存在着紧张甚至是矛盾的关系。这就是说,自由关心的是个人权利,或者“不允许任何人穿越”的“自由阵地”;民主关心的是对于个人和集体行为的控制,是公共责任。福山没有探讨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紧张甚至矛盾的关系。^[10] 那些就此进行深入探讨的作者,已经在相当不同的方向上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平衡问题上,福山究竟采取什么立场,是不清楚的。此外,并不存在无可争辩的民主形式。即使自由主义民主也具体化为各种各样不同的制度类型,比如,威斯敏斯特模式(即议会政治模式——译注)和联邦模式,这就使得对于公共生活的任何自由主义诉求无论如何也是不清楚的。福山实际上没有分析民主的全部含义及其可能的变种。

福山对于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和市场机制的确认,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的一个核心假设是,如果去除了各种各样的“不完美”(比如,工资和价格的“连带性”),那么,市场基本上自我平衡和“利益清晰的”。他认为,市场本质上是协调的“非权力”机制。因此,他忽视了探讨这样的问题,

即在某种程度上,市场关系本身就是可以限制和制约民主过程的权力关系(见第六章关于新多元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他没有进一步探讨收入、财富和机会中的一系列不平等是否是由市场关系的现有形式造成的,这种现有形式的市场关系就是最低限度管制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他没有考察一种特殊的自由,即积累无限的经济资源的自由,是否向全体公民能够享有政治自由的程度即公民在政治过程中平等活动的程度提出了挑战。不考察这种挑战,就可能忽视当今世界上对于自由的一种重要的威胁;这种威胁并不像德·托克维尔和 J. S. 密尔等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产生于对于平等的要求,而是产生于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侵犯了政治自由和民主政治。

此外,尽管福山注意到了全球秩序两极化的危险,但是,他并没有考虑到,所有制和控制的不平等程度和生活机会的最终不平等造成了利益的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引起西方内部及西方与“发展中世界”之间价值、原则和信仰即意识形态的冲突。在国家 and 国际层次上,关于经济制度本质和选择可取的经济组织形式的不同“意识形态”考虑之间,都存在着斗争的可能性,福山低估了这种可能性。比如,以下看法就并非不证自明的:现有经济制度可以为非洲和其它地方正因为饥饿而面临死亡的千百万人(1993 年估计在 2700 万人,见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1993 年的报告)创造基本的生活条件,或者为这个星球上面临着全球可能变暖、臭氧层破坏殆尽和维持生命的自然资源不断遭到毁灭的全部人口提供基本生活条件。远非不证自明的还有:现有经济制度是与把所有人视为“自由和平等”的自由主义本身的关心一致的。如果缺少这样的一致性,那么,人们可以假定,随着人们

进一步探求“更加公正”和“更加安全”的经济秩序，自由主义就会面临新的批评。

此外，福山自己对于意识形态冲突的原因的考虑是没有说服力的。他对于意识形态特点的论述是成问题的，撇开这一点不谈，他对民族主义和宗教运动，特别是宗教基本原理所持的看法，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比如，他认为，伊斯兰教不是一种普遍的诉求，因此，它不是政治意识形态；它的诉求仅限于穆斯林世界。但是，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糟糕的问题。出于同样的理由，可以使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自由主义本身不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因为它不能引起一种普遍的诉求；归根结底，它对于穆斯林世界，或者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此外，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和绿色运动一类的社会运动产生的某些政治争论源远流长，这些根源也没有予以考察。

最后，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看法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因为这些看法不仅忽视了西方民族国家内部和外部在自由主义和关于政治的利益自由主义观念上仍然存在争论，而且忽视了：既然我们能够充分了解世界上产生于决定性因果轨道和制度变化的限定模式的冲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全部重要根源是什么，也就同样能够充分了解世界上产生于偶然事件、未曾预料的事件和无法估量的事件的冲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全部重要根源是什么。我们的所知，基本是建立在已有之物基础上的，即基本是建立在过去之物而不是将来之物基础上的。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我们可以用黑格尔来驳斥福山，因为正是黑格尔提醒哲学家们：“只有黄昏降临时，智慧之神的猫头鹰才展开翅膀。”^{〔11〕} 我们并不能指出，可以动员群众和使新型的政权合法化的新的正统学说是仁慈的还是强制性的。20 世纪的永恒启示之一肯定是，

历史没有终结，人类进步的成就仍然是极其脆弱的，无论人们如何定义和把握它。民主的实际形式和构成很可能将一代一代持续争论下去。

马克思主义更新的必要性和“自下而上”的民主

如前所述，经典的和当代的自由主义理论普遍认为，必须予以认真考察的问题是：男人与女人之间，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之间，不同的种族团体之间的现有关系是否允许形式上承认的自由得到真正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缺乏各种各样的资源和生活机会，在积极参与政治和公民事务方面受到一系列的限制，如果福山一类的自由主义者认真考察以上这些问题，他们就必然会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有更直接的理解。

阿历克斯·卡林尼科斯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的强有力的辩护者之一，他探讨了以上的相关命题，认为，自由主义民主的承诺已经破产了。他按照意大利政治理论家诺伯特·博比(Norberto Bobbio)的看法，认为这些承诺是：(1)政治参与；(2)负责的政府；(3)发表不同意见和改革的自由。他认为，“实际存在的自由主义民主”在全部这三个问题上都是失败的：其特点是存在着大量的消极公民(相当数量的合格公民在选举中不投票)；非选举产生的权力中心侵蚀并代替了议会制度(其典型的特征是官僚权威、功能性代表和社会保障的作用的扩大)；对于国家行为、尤其是对于资本主义逐步改革的可能性存在着实质性限制

(比如,资本流向海外是对具有强有力的社会改革纲领的当选政府的持续威胁)。

在这种背景下,卡林尼科斯力图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尤其是直接民主模式辩护,并企图重新确立其地位,他的论据是:民主只能来自于“下层”,来自于工人阶级的自发活动。卡林尼科斯断言,在马克思的教科书中,在“20世纪苏维埃民主和工人委员会的丰富传统”中,可以找到与自由主义民主不同的民主选择。由此可见,支配了苏联历史的斯大林主义可以被看作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否定。卡林尼科斯认为,斯大林主义是一种非革命的力量,它在20年代末建立了一个反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这就是说,在这个政权中,国家官僚抽取剩余价值,控制资本积累,履行曾经由有产阶级承担的角色。斯大林使1917年10月在列宁领导下迅速建立起来的激进的工人民主无法实行。因此,在卡林尼科斯看来,不能把1989年斯大林主义的消失看作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他坚持认为,失败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极度歪曲。1989年获胜的不是“民主”,而是资本主义。东欧变化的结果将使统治阶级在政治上重新组织,使东欧的技术官僚精英可以把他们的经济完全与世界市场结合为一体,促成一个国家向全球资本主义转变。

卡林尼科斯抨击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等式。他认为,斯大林主义与马克思和列宁有“本质区别”。^[12] 马克思的理论和列宁的实践所认可的制度,其特征不仅不是一个人的统治,也不是“对于社会生活、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方面的等级性有组织的控制,不是处于党和国家机关顶点的狭隘的寡头政治”。^[13] 此外,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一些内容,为理解斯大林主义政权的终结提供了基础。按照卡林尼科斯的看

法，有三个命题具有特别的相关性。首先，马克思的著作，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丰富和发展的内容，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发展的根本冲突出发，从既调节又加剧这种冲突的阶级之间的根本冲突出发，探讨了时代的转变。这种探讨为理解斯大林主义秩序的逐步崩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框架。

第二，在托洛斯基主义传统的著作中，存在着理解斯大林主义特定性质和演变的基础。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指出了斯大林主义政权中支配着官僚制和国营工厂的剥削统治阶级与并未有效地控制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使斯大林主义政权走向了“深深的危机”。尽管中欧和东欧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结合为一体暂时解决了这一危机，但是，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矛盾可能导致将来更大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

最后，在确定人类解放的纲领时，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一种与东西方现有的阶级统治政权不同的方案。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社会主义观念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与此同时，它坚持马克思所提出的一种观点，即“绝大多数的、为了绝大多数的利益的自觉的独立运动”。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观，它完全不同于苏联和东欧集团中一度通行的统治形式，也完全不同于自由主义西方被阉割了的民主。无论国家社会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民主，都没有提供使人民权力获得自由的政治纲领。参与型民主的纲领也是如此，它根本没有特别指出资本的经济权力，以及由此对于民主政治转变构成的主要障碍。尽管麦克弗森和帕特曼等思想家对于自由主义作出了让步，但是，卡林尼科斯却坚持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框架在所有的基本方面都具有当代意义。

现时代是由一个单一的、统一的经济制度构成的，它的特征是剥削与不平等。“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与自我均衡的市场之谜不同，它的特征是：经济权力的集中；单个民族国家控制之外的公司的发展；以生产过剩、无政府和浪费为内容的周期性危机；西方内部贫穷的存在，以及西方与其它地区之间生活机会的极大差异；失控的资本主义积累正以使全球变暖等方式对于人类生活造成威胁性影响。按照卡林尼科斯的判断，“资本主义已经日暮途穷”，现在是重新实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直接民主的时候了。^{〔14〕}

如同第三章所指出的那样，按照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自由主义传统，政治常常被等同于政府的领域和公民与政府领域的关系。如果这个等式成立，如果政治被看作是与经济或者文化相分离的领域，那么，政治的大部分核心内容就要被排除在人们的视野之外。马克思主义特别尖锐地批评这种观点，坚持认为当代权力的根本来源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自由主义对此所持的非政治化看法是不能接受的。如同卡林尼科斯强调指出的那样，这一批评提出了若干重要问题：首先，是否可以认为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不具有政治性？由此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经济权力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是政治的构成因素？但是，甚至用一种比较灵活的看法，假定政治与经济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那也产生了若干问题。马克思主义力图联系经济和阶级权力来理解政治，拒绝把政治看作一种自成一类的（*sui generis*）活动，但是，它本身也倾向于把某些问题边缘化，或者排除在政治之外：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简化为与阶级相关的问题，参与型民主主义者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因此，如果像卡林尼科斯那样把资本主义秩序看作一个无